



空间、历史与发展:全球叙事对地域社会研究的启示^①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李万伟

资本主义及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对此前人也给出不少解释,但这些解释往往走上两个极端,不是陷入“西方中心论”就是走向“民族中心论”,不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贡献不够尊重,就是刻意抹杀欧洲地区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作用。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通过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以全球棉花产业为载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解答。在时间上,将资本主义发展分为“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在空间上,跳出欧洲看欧洲,从全球各地的互动来关照资本主义发展。通过对多元时空的统合考察,贝克特揭示出“战争手段”对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与“国家体制”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关系转变对资本主义发展、转折的影响,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讲述的是欧洲主导的棉花帝国兴衰的故事,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棉花贸易帝国在“战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创建与运作,主要包括本书的第1到第2章。第二部分阐述了棉花制造帝国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腾飞与发展,主要包括本书第3到第9章的内容。第三部分则阐述了全球棉花市场的重建及棉花销售帝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后期的发展趋势,包括本书的第10到第14章。

一、“战争资本主义”与棉花贸易帝国

棉花贸易帝国的诞生,首先建基在全球棉

花贸易市场的形成,而全球棉花贸易市场的形成则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公元10世纪以前、公元10—16世纪和公元16—18世纪。

公元1000年以前,棉花种植和加工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地区,以家庭生产为主,自产自足,较少具有商品性质。随着需求增加,棉花逐渐走出家庭,作坊生产棉花产品变得越来越普遍,职业织工在亚洲出现,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逐步增长,地方性贸易网络逐渐形成。此后,经过漫长的时间,棉花生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棉花产品传播到世界各地,棉花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商品。但在全球棉花种植、加工和消费的网络中,欧洲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商人缺乏棉花原料来源和贸易地理优势,此时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印度和阿拉伯商人。16世纪初期,哥伦布登陆美洲发现可以植棉的大批土地,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与印度建立贸易关系,欧洲有了重塑全球棉花网络的可能。17世纪,欧洲各国逐渐在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欧洲武装商人介入亚洲贸易,用武力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印度、阿拉伯商人从跨洋贸易中排挤出去,随后又用印度的棉纺织品在非洲换取奴隶运往新大陆开辟土地,一个欧洲人主导的将亚洲、非洲、美洲紧密联系起来的新贸易体系逐渐形成。到了1780年,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

斯文·贝克特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能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取得主导地位,与“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战争资本主义”是贝克

① 本研究受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8B716X14) &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18_0499)——干旱地区耗水型产业发展的社会机制及其风险研究的支持。

特分析资本主义起源的独创性概念,也是本书的核心论点。“战争资本主义”将世界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内部区域包括欧洲殖民帝国及其国家主导的秩序、法律、体制和习俗,外部区域则是受到帝国支配的其他地区,在这里原住民遭到屠戮,资源遭到掠夺,人民遭到奴役,大量土地被私人资本家占据^[1]。“战争资本主义”重组了经济空间结构,多中心的世界逐渐变为单一中心的世界,以欧洲为主导的棉花贸易帝国正式诞生。

二、“工业资本主义”与棉花制造帝国

棉花制造帝国的诞生,与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密不可分。首先是工业革命起源于棉纺织工人对纺织工具的改造,而其催生的机器工业又推动了棉花制造帝国的发展。同时,在棉花制造帝国发展的过程中,欧洲在前期棉花贸易中形成的“战争资本主义”和“国家体制”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发展带来极大阻碍。

1784年,塞缪尔·格雷格在英国曼彻斯特创建第一家水力驱动纺纱厂,开启了机器革命,“工业资本主义”随之到来。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前两个世纪“战争资本主义”的产物。英国资本家虽然控制了许多全球性棉花产品网络,但是过高的工资成本使其棉花产品无法在全球棉花市场与印度竞争。“战争资本主义”双轨制对内改造促使英国商人、发明家及制造商降低劳动成本,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骡机”等一系列纺织工具的发明提高了纺纱效率,英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下降,棉纱价格也很快低于印度棉纱,英国棉纺织业突飞猛涨。同时,“战争资本主义”对外开拓的经济渠道,也帮助英国棉纺织品扩展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更多臣服于“战争资本主义”的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军事-财政”的“国家体制”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

工业革命开启后,英国纺纱工厂的生产效率大增,旧有原棉供应网络供不应求,原棉价格随之增长,在旧大陆无法解决这一需求时,欧洲商人开始劝说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主扩种

棉花。在政府支持和价格刺激下,加勒比地区的棉花种植业出现爆炸式增长,其中圣多明各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其迅速扩张主要得益于非洲奴隶的进口,在18世纪80年代棉花繁荣的鼎盛时期,每年有近3万奴隶被运到圣多明各。1791年圣多明各爆发奴隶起义,加勒比地区棉花出口量锐减,美国的棉花种植业却迎来了决定性突破,1793年,伊莱·惠特尼发明新的轧花机,美国陆地棉加工突破技术瓶颈,从而带动了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为了大规模扩大棉花生产,美国种植园主引入成千上万的奴隶,并将棉花种植园引入西部和南部更广阔的地区。在棉花种植园主的支持下,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军事-棉花”综合体,驱逐印第安人原住民,侵略性地获得了许多新领土,“战争资本主义”的区域继续向外推进。

除了棉花原料供应,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端,即制造工厂与工厂劳工的结合中,“国家体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革命主要是关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但生产率随着机器使用提高以后,棉花产品价格下降,需求增多,就需要更多劳动力参与进来,如何将工人迁入工厂就成为棉花帝国能否成功的关键。虽然依据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如家长制,儿童、女性率先被动员进入工厂,但要把成千上万的人变成无产者并顺利进入工厂劳作还需要国家在削弱封建精英释放劳动力、压制工人阶级集体运动方面为资本家提供有效帮助。此时,棉花机器制造业集中于欧洲地区,主要原因就在于欧洲能够提供一个能够保护国内市场、进入偏远市场以及建设促进制造的基础设施的“国家体制”。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之所以未能建立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决定性原因在于“战争资本主义”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奴隶贸易、发展奴隶制削弱了其他地区的国家能力,同时也限制了新式机器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劳动力动员也就无从谈起,埃及、巴西和印度就是典型受“战争资本主义”削弱的国家。

三、“全球资本主义”与棉花销售帝国

“战争资本主义”催生了棉花制造帝国,繁

荣了“工业资本主义”,但这种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对内进行劳工剥削的“战争手段”和“国家体制”并非一成不变。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全球棉花市场的最大原料供应链被切断,棉花制造帝国陷入危机。欧洲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国家工业,纷纷向殖民地政府施压,埃及、巴西和印度的棉花种植业迅速发展。美国奴隶制危机迫使世界更多地区卷入棉花资本主义生产,这虽然增加了原棉供应量,但也掀开了棉花制造帝国的衰落之幕。

首先,在“工业资本主义”未曾普及的地区,农民原先主要是为了家庭自用种植棉花,为市场种植处于次要位置,欧洲资本家为了改变农民的这种偏好,借助民族国家的权力,通过颁布合法的强制措施,迫使农民变为棉花种植工人。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利用合同法、新的土地财产权、铁路和帝国对领土的控制等手段,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世界农村,“工业资本主义”的制造业中心和这些地区的农村建立了新的关系,工业资本逐渐深入到棉花的实际种植者之中。资本家与政治家共同努力加快了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崩溃,越来越多的农民与全球市场相连接,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国家力量的重组得以完成。

其次,在棉花帝国内部,全球网络不断扩大其覆盖范围,新兴民族国家与传统帝国共同组成了新的全球网络,这些网络反过来又加强了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全世界到处都是曼彻斯特,棉花不仅在世界的新地方种植,也越来越在世界的新地方被纺织和加工。一战以后,英国的棉花产业开始失去其全球优势,随后是欧洲大陆和美国,日本、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棉花工业则迅速发展,全球棉花制造业出现地理大转移。棉花制造业大转移主要在于“国家体制”的不同作用:在新兴民族国家,民族资本家与支持本国工业化项目的“国家体制”相结合,利用工资较低的工人资源,加速了棉花制造业的地理改变;而在欧美国家,随着工人群体进入“国家体制”,其不断组织起来的为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罢工获得国家默许,使劳动力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为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南方国家制造业发展开辟

了新的可能。

二战结束后,取得独立地位的南方国家,通过更强大的国家力量整合领土、资源和劳动力,棉纺织工业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欧美国家的棉产品制造业却在不断走下坡路,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只占全球棉布出口量的2.8%,纺纱工人不过3万,欧洲对棉花制造帝国的统治悄然结束。今天,中国的纺织工厂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锭锭和织机,消耗世界原棉产量的43%,而北美和西欧分别使用全球棉花产量的4.2%和0.7%。随着制造业转移,棉花种植中心也随之转移,棉花种植对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变得极为重要。2012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产量占到全球棉花总产量的62%,其中印度和中国占到全球一半的水平。200多年后,全球棉花的种植、加工重心再次回到1780年以前的棉花产业中心地带。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欧洲虽然结束了对棉花制造帝国的统治,但并没有回到1780年以前的边缘地位。在全球棉花网络重心回归亚洲的同时,网络中的种植者、商人、制造商和国家的权力平衡也在发生变化,贝克特所称的“资本主义无休止的革命仍在继续”。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全球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加强,欧美商人逐渐摆脱了以前对特定国家的依赖,为了追逐利润在全球各地进行生产转移,从一个贫穷国家转移到一个更贫穷的国家。以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为代表的大型零售商和一些品牌服装销售商逐渐取代传统的制造商,成为棉花商品链的主导,棉花销售帝国在制造帝国的废墟中逐渐建成,而欧洲也再次成为新的棉花帝国的引领者。

四、贡献与启示

作为全球史的经典著作,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运用的全球叙事方法,不仅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有巨大贡献,对于历史领域之外的地域社会及其产业发展研究也有很大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棉花生产发展

迅速,1982年,中国棉花总产360万吨,占世界棉花总产的24.4%,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中国棉花总产680万吨,占全球棉花总产29%,依然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棉花种植的主导者。但在中国棉花内部生产中,各地区并不均衡,新疆棉花生产一家独大,占中国棉花总产50%以上及世界棉花总量的15%,然而在30年前,新疆的棉花产量才不过15万吨,只占中国棉花总产的4%和世界棉花总产的1%。短短30年间,在中国棉花生产突飞猛进的同时,新疆地区也发生了剧烈变迁。棉花已经成为当地的经济命脉和主要农作物,这种大规模的棉花种植给当地带来巨大环境风险。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疆南部植棉区的主要灌溉水源塔里木河开始出现断流,90年代断流长度进一步扩大,到了2009年,断流长度超过了1200千米,断流时间也由1990年的16天发展到1995年的67天,2000年的127天,2008年增至228天,拯救塔里木河成为新疆社会各界的广泛呼声。

新疆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棉花生产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中国棉花生产空间转移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棉花生产发生两次空间大转移,第一次是80年代棉花生产重心从长江流域北移到华北地区,第二次是90年代华北地区棉花生产下降,棉花生产重心西移到新疆地区。这两次空间大转移背后既有国家的力量,也有资本的支持,还有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国棉花及棉织品在全球棉花市场中的消涨有所关联。结合对新疆地域社会及其棉花产业的研究,笔者认为本书可以提供以下三点借鉴。

第一,全面考察新疆社会及其棉花产业的发展历程。全面考察的基础在于全面占有资料和深入调研,为了从全球视野来考察棉花,贝克特曾在全球各地高校和研究所从事档案研究,可以说,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的足迹几乎遍布任何有棉花出没过的地方,所以这本书才能够呈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丰富的棉花信息。由是观之,我们在做某一地域研究的时候,即使不能从全球范围占有资料,但也要尽量跳出特定地域局限,从更大范围搜集资料。新

疆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棉花产业受中国棉花产业乃至全球棉花产业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于新疆社会及其棉花产业的研究,不可避免要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搜集资料进行分析。

第二,突破地方叙事的局限,注重考察特定地域社会在整个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网络中不同主体的关联互动。全球叙事帮助贝克特突破了国家史和地方史的局限,使我们看到地方性历史和全球史之间的联系及它们之间在更大一个网络中的相互关联。在新的叙事框架下,“棉花帝国的故事犹如一部宏大的交响乐章,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旋律下,各种相关的历史变奏曲都在其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演绎。”全球史写作与其他历史写作不同,它不仅关注历史进程中的历时性,更关注同时性和共时性,也即关心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地方存在的某些现象之间有什么联系?换句话说,它青睐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2]。当然,这里所讲的空间,并不是指纯粹的地理空间,而是指依托于空间的互动,毕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3]。因此,我们在研究新疆地域社会及其棉花产业时,要在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之间互动的视角下去观察,毕竟新疆棉花急剧大规模发展与我国主产棉区的空间转移密切相关,而我国棉花产业的发展又与全球棉花产业的空间转移不无关联。

第三,特别注重透过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发掘某一地域社会发展转型的动力机制。通过分析对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更多是欧洲单方面的入侵、剥削、霸权和管控)历程,贝克特发掘出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战争手段”和“国家体制”,使我们认识到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共同分享一些本质性的特征,如暴力的使用、对外部领土资源的占有、对不同空间劳动力队伍的重组、跨国网络的建设以及资本主义与“国家”的结盟等,这些特征并不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才出现,而是起源于战争资本主义,并在工业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继续使用,只是方式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互动”愈益增多,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对我国影响也愈加深入,

新疆虽然地处我国边缘地带,但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也概莫能外。因此,借鉴叶敬忠教授倡导的“中心—边缘”的分析范式,从市场、科技、环境、政策等维度讲述后发国家边缘地带的农业生产故事^[4],深入分析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以及边缘国家内部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互动”,或许可以发掘出新疆棉花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李万伟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邮编:211100。)

[参考文献]

- [1] 贝克特.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徐轶杰,杨燕,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 [2] 奥斯特哈默. 关于全球史的时间问题.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56-62
- [3] 刘新成. 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 全球史评论(第二辑),2009:3-12
- [4] 叶敬忠. 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乡村的现状和未来 ——首届“‘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国际论坛”会议综述

冯璐 曾艳 赵鸭桥 唐丽霞

2018年11月7日至9日,由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和“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国际论坛”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召开。来自英国牛津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印度阿育王大学、孟加拉农业大学、缅甸蒙育瓦经济大学、泰国清迈梅州大学、越南太原农林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柬埔寨全国国土管理委员会、老挝农业部的农村发展知名学者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国内农村发展的专家学者共11国45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将主题聚焦于“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乡村的现状和未来”,涉及“一带一路”乡村振兴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分别围绕“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乡村变迁”“土地政策与乡村振兴:国别案例分析”“农业工业化/城市化与乡村:主要的问题”“乡村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四个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分享交流了各自国家乡村转型的现状、挑战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并最终形成中国-南亚东南亚乡村振兴研究网络成立倡议。

一、发问南亚东南亚乡村振兴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指出“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有望延续,我国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同时国际农产品贸易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突出,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妥善应对国际市场风险任务紧迫”。我国于2014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全球有目共睹。但是,我国海外投资数额与美国、日本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以日本为例,到2015年3月日本的海外投资额就已达62399亿美元,远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数额,增速势头迅猛而且多集中于东南亚地区。这反映出我国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仍然较弱,而这种能力的强弱,既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对全球经济走势和发展的影响力,也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利用全球资源来优化本国或本地区资源配置的能力,保障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开放型经济国家在发展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